

黄毅 许建平◎著

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 视角与方法



黄毅 许建平◎著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研究的 视角与方法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视角与方法 / 黄毅, 许建平
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4
ISBN 978-7-309-05929-8

I. 二… II. ①黄…②许… III. 古典小说—文学研究—
文学史—中国 IV. I207. 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7472 号

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视角与方法

黄毅 许建平 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韩结根
总编辑 高若海
出品人 贺圣遂

印刷 句容市排印厂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125
字数 227 千
版次 2008 年 4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 100

书号 ISBN 978-7-309-05929-8 / I·424
定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一部系统论述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视角与方法的专著。通过对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历史的梳理，分析各种研究视角与方法的得失，为今后的学术研究提供参照与借鉴。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综论篇”，探讨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文献学、社会学、形式分析、经济学等主要视角与方法；下编为“个案篇”，以最能体现一个世纪小说研究全貌与视角方法转换历史的《红楼梦》研究为个案，具体考察分析了红学史上曾出现的10种研究视角与方法。本书力图运用现代文艺理论来重新评价传统的小说研究方法，同时以小说研究的实践来检验现代文艺理论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对于古代文学特别是古代小说研究者来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目 录

上编：综 论 篇

第一章 小说文献学的视角与方法	3
第一节 目录学的视角与方法	5
第二节 校勘学、版本学的视角与方法	20
第三节 史科学的视角与方法	26
第四节 《四库全书总目》对小说文献学的影响	32
第二章 小说经济文献学的视角与方法	36
第一节 经济文献学对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意义	37
第二节 小说经济文献学的研究方法	41
第三节 《金瓶梅》流通货币质态与成书年代 ——运用经济文献学研究小说之实例	45
第三章 文学文本的形式分析方法	60
第一节 文本分析是文学研究的基础	60
第二节 文本研究中的内容和形式问题	63
第三节 语言分析是文本研究的核心	64
第四节 文本的深层结构——从语像到意境	67

第五节	作品的形式结构和作者思想情感的对应关系	71
第六节	文本的形式结构与作者的心理结构	75
第七节	人性的发展和人的文化心理结构	77
第四章	文本意义的确定性分析法	81
第一节	文学语言的三重属性：单一性、复义性、超越性	82
第二节	文本意义产生之源：复现性意义的语源、衍生意义的语式、经验图式的想象扩张	86
第三节	创作意图、文本意义、读者感受及其关系	94
第四节	确定性意义、非确定性意义及其关系	98
第五章	社会政治学的视角与方法	103
第一节	对“经世致用”思潮的审视	104
第二节	“经世致用”思潮影响下的小说研究历程	106
第三节	“经世致用”思潮留给小说研究的教训	113
第六章	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研究方法的世纪回眸	118
第一节	“五四”前后，文化革新与学科创建期	118
第二节	30—40 年代，由多元趋于一元的学术定型期	120
第三节	50—70 年代末，社会学研究模式占主导地位 的学术畸形期	121
第四节	20 世纪最后二十余年，由收缩到开放、 由一元到多元的学术转型期	125

下编：个案篇——《红楼梦》 研究方法论

弁言	133
第一章 索隐派的视角与方法	137
第二章 理论批评派的视角与方法	146
第三章 考据派的视角与方法	165
第四章 文本分析派的视角与方法	216
第五章 《红楼梦》文献学的视角与方法	239
第六章 社会学批评的视角与方法	244
第七章 形象论析派的视角与方法	256
第八章 文化学研究的视角与方法	279
第九章 形式分析的视角与方法	288
第十章 比较研究的视角与方法	298
第十一章 红学史研究路向与方法的论争	308
后 记	316

上编：综 论 篇

第一章 小说文献学的 视角与方法

小说研究同其他一切研究工作一样,有两点是从事研究所必备的条件。一是研究的对象,二是研究的依据,这两者统隶属于小说文献的范畴。没有研究对象就无所谓研究。没有《石头记》哪来《红楼梦》研究?此理甚明。同样,研究《红楼梦》,研究小说需要可靠的版本,需要可靠的与之相关的史料。《红楼梦》研究需以前八十回的脂评本为版本依据,需要记载江宁织造曹家与康熙、雍正帝来往密折的档案史料;若以《红楼梦》后四十回,或修改后的一百二十回为版本依据,所谓的研究就没有坚实的基础,所得出的结论必距历史的原貌愈来愈远。郑振铎先生有一段话,将此理讲得浅显明了,今列于下:

研究中国小说的方向,不外“史”的探讨与“内容”的考索。但在开始研究的时候,必须先打定了一种基础,那便是关于小说本身的种种版本的与故事的变迁。不明白这种版本的与故事的变迁,对于小说之“史”的及内容的探讨上是有多少的不方便与不正确的。记得有人论《水浒传》的社会,而所据的版本,却是金圣叹腰斩的七十回本,于是便纵

谈到“作者”为什么要把卢俊义的梦境作为结束的原因。这岂不是“一著错，全盘都错”了么？又有人真的相信陈忱的《后水浒传》乃是明人作的，因为《序》上有“万历”字样，又有人相信它是元人的东西，因为首页的中缝，有“元人遗本”四字。这岂不也是颠倒了历史的事实了么？所以，“版本”、“目录”的研究，虽不就是“学问”的本身，却是弄“学问”的门径。未有升堂入室而不由门循径者，也未有研究某种学问而不明了关于某种学问的书籍之“目录”、“版本”的^①。

所以小说文献是从事小说研究的基本条件，文献学的视角与方法也是小说研究的首要视角与方法。

那么，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对象——文本的面貌如何呢？至少在上一世纪初之前，存在着四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小说目录混乱，且时断时续，残缺不全。就唐前而言，小说的概念没有明确的内涵，故而造成了小说目录学的杂乱。以《汉书·艺文志》为例，其中所列“小说”十五家，1 830 篇，既无人物形象，也非完整的故事，不过是“街谈巷语”的杂说一类，没有一篇是真正意义上的小说。且这些篇目都散佚了，造成了文本的一个空白时代。至于后来的史书，直到《四库全书总目》，也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与史传、杂传、杂事、杂家等搅混在一起的问题。所以就古代典籍的目录学而言，小说的目录并不那么清晰（私家藏书、著录要好一些），以至于鲁迅写《中国小说史略》时，不得不自己下苦功去搜集、阅读小说，不得不花更多时间去弄清自己的研究对

^① 郑振铎《中国小说史料·序》，见孔另境《中国小说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象的面目。而事实上写入《中国小说史略》中的小说数量有限,鲁迅因未能读到作品而留下了不少遗憾。如果那时有一本专门的小说目录,就不会如此。可见小说文献对于小说研究史的重要性,也说明,从上一世纪初,对于小说研究者来说,小说文献的研究多么迫切,任务多么艰巨,便可想而知了。其二,读者能见到的小说文本直到上一世纪中叶,仍是十不及一。尤其是通俗小说大量被尘埋或流失境外。其三,能见的小说文本的版本良莠皆存,混乱不明。马隅卿(廉)有《旧本三国演义版本的调查》著录版本9种,赵孝孟有《水浒传版本录》著录不同版本40余种,以后研究版本的文章甚多,然而关于《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西游记》、《金瓶梅》乃至《红楼梦》的版本,直到目前还不是那么清楚。小说版本研究存在着广阔的空间。其四,已发现和不断发现中的小说文本字句脱落者,错字、别字、同音异字者随处可见。以上四个方面问题,使得弄清小说研究对象成为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首要而艰巨的任务。同时,四个方面的问题使得小说研究者将研究的视角集中于此,逐渐形成小说文献学研究的六种视角与方法,即目录学的视角与方法、辑佚学的视角与方法、分类学的视角与方法、校勘学的视角与方法、版本学的视角与方法、史料学的视角与方法。为了叙述的连贯性,我们将与目录学关系紧密的辑佚学、分类学的视角与方法置于目录学中加以说明,而将校勘学与版本学合二为一并之叙述。

第一节 目录学的视角与方法

小说目录学的最终目的在于从古书中整理出一个小说目

录,以便确定小说研究的对象和这个对象的范围,给从事小说研究的人指出所应读之书。说得简明点,就是以书的目录形式确定小说研究的对象。由此可知,这一视角所涉及的知识领域包括:小说观念的确定;小说文本及相关史料的搜集;小说类型的划分;小说产生时间的界定及历史排序。

一、小说观念的确定

中国古代传统目录学中的小说观念,从总体上说落后于小说的创作,由此造成的小说观念与小说创作分离的现象十分明显且很严重。就小说创作而言,至少到了六朝时,就有了现代意义的小说,如《穆天子传》和《搜神记》中的志怪小说、《世说新语》中的志人小说。唐代出现的“传奇”,在“有意为小说”的意识方面较之六朝更自觉。唐、宋两代的话本,明、清的长篇、短篇、中篇小说数量惊人。然而,自六朝直至清代编《四库全书》时,史家或四库馆臣们的小说观念一方面依然沿袭着《汉书·艺文志》中的观点,将小说视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小道”,另一方面,承接史家之观点,或将小说与杂史、杂传类并列(如《旧唐书·经籍志》),或将其剔出史传(如《新唐书·艺文志》),从而使得小说的概念更庞大而杂乱。直至《四库全书总目》仍是如此,仍将小说从史传中剔出,而列入杂史、杂传和杂说的小说家之中。《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序》云:“小说九百,本自《虞初》。《汉书·艺文志》载《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注称武帝时方士,则小说兴于武帝时矣。……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漫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富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整个思路不出孔子“虽小道,也有可观,致

远恐泥”的框架。所不同者,小说的观念更庞杂,除“琐语”外,又加入了原属于史书的“杂事”、“异闻”两类,与现代意义的小说概念尚有较大距离。所以小说文献的研究方法,首要任务就是在理论上确定小说之概念。

确定小说概念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以西方小说概念为准,还是依中国古代小说概念为据?中国古代小说概念是杂乱的,需细加甄别和改造。西方小说概念是先进的,但并不一定与中国古代小说全吻合。况且,我们研究的是中国古代小说文献,既不能脱离中国小说创作的 actual,也不能完全抛弃传统目录学于一旁而不用,故不得不在方法上要注意两个立足点与两个结合。两个立足点即:立足于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历史实际,立足于中国目录学特别是小说目录演变的历史实际。两个结合即:将西方的小说观念与中国小说创作的 actual 相结合,寻找符合中国小说发展特性的小说观念;将西方的小说观念与中国传统的目录学相结合,对传统目录学著作所载小说进行甄别,去非纳是,重新建立符合小说文体的小说目录学体系。后一点好办,不少目录学著作就这样做了。如朱一玄、宁稼雨等编著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前言》明确表示:“在充分尊重与继承古代小说目录学成就的基础上,依照今人对小说概念的理解,确定古代小说的范围,是我们在编纂本书时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而其解决的方法也很明确:“我们对历代书目中著录的小说家作品,予以认真甄别,选取其中大致属于小说的作品,剔除那些完全没有小说因素的文言笔记。而对于历代书目并不著录于小说家之列或未予著录,但明显属于小说的作品,亦尽量予以收录。同时,我们还考虑到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历史与基本事实,对于一些含有小说因素,并对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具有一定影响的作品,如

一些笔记和诗话等,亦酌情采录。”^①关于前者,即将西方小说观念与中国小说创作的历史事实相结合,则由于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历史有明显的变异性,唐前“残丛小语”类小说与西方小说观念相距较远(与传统小说观念较近),唐及其以后小说,特别是白话通俗小说则与西方小说概念基本相合,故以中国通俗小说为契合点,沟通西方小说概念,确定中国小说的概念,便成为一条可行之路径。许多学者在研究中走的正是这样一条路。

今略举几例:蒋瑞藻的《小说考证》。此书将戏曲也列入小说之列,可知作者的小说观念尚不十分明确。但他已认识到,现代小说与古小说概念的差异,其卷一云:

今之小说,非古之小说也。今之小说,其殆出于宋天圣、嘉祐间乎?传言仁宗御宇,国家闲暇,朝臣日进一奇怪之事以娱之。平话日出,海宇风靡。

说明蒋瑞藻已看到通俗小说即现代小说。不仅如此,他还将小说分为“小说”与“平话”两类。“小说所以敷衍正史,而平话又以敷衍小说,小说间或有与正史相同,而平话则皆海市蜃楼,凭空架造,然其中亦有标异出奇,豁人心目者。”由此可知,他所说的“小说”多指文言小说,而所谓“平话”,则指通俗小说。然进一步追问:小说文体与其他文体的具体区别是什么?却未予以说明。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虽无专论小说概念的文字^②,然在历

^① 朱一玄、宁稼雨、陈桂声《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前言》,《南开学报》1996年第2期。

^② 第一篇《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主要叙述史家视野下的小说概念和著述,认为史家成见,自汉迄今,盖略同。然而,他并未阐述自己的小说概念。

史的梳理与陈述中,表达出小说的本质在于虚构、叙事、文采。并以此为标准,论述唐代传奇与此前小说本质的差异,认定唐传奇才是现代意义上的小说。

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此类文字,当时或为丛集,或为单篇,大率篇幅曼长,记叙委曲,时亦近于俳谐……幻设为文,晋世固已盛,如阮籍之《大人先生传》,刘伶之《酒德颂》,陶潜之《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皆是矣,然咸以寓言为本,文词为末,故其流可衍为王绩《醉乡记》、韩愈《圜者王承福传》、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等,而无涉于传奇。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①。

在这段评述文字中,谈及“文辞华艳”、“施之藻绘”、“究在文采”、“叙述宛转”、“记叙委曲”、“幻设为文”、“意想”、“扩其波澜”、“篇幅曼长”、“有意为小说”。可知鲁迅是将虚构、叙事、文采、篇幅长短和有意为小说五项内容,作为评定是否为小说的标准。他虽并未专写小说概念的文字,但在他的评述文字中已流露出他的小说观念。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鲁迅全集》第9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0—71页。

郑振铎在谈及短篇小说时，也有类似的议论，且讲得更明白：

中国的短篇小说，在唐代才开始发展，才有具有很美丽的故事和很完善的结构的作品流传下来。在这个文学艺术的伟大时代之前，我们已经产生了很漂亮、很动人的故事和传说，还可能已有了完美的短篇小说，但大部分没有保存下来。就保存到今天的唐代以前的故事和传说看来，他们一部分是和古代的寓言分不开的，那就是引用了故事和传说，来说明某些哲学家的论据的；其他一部分，其中一部分乃是宗教徒们……用来宣扬宗教的信仰的。……还有的一部分，乃是记录人世间的嘉言善行或漂亮的言语，可笑的举动的。……但都是相当地简短、质直的记载，只是瘦骨嶙峋的故事和传说，还不能够构成有血有肉、有声有色的短篇小说。到了唐代方才产生了描写婉曲、想像丰富、人物的性格写得很真实的短篇小说。

这里，郑振铎先生比鲁迅先生上述小说观，又多出了两项内容：人物性格、结构的完整。再往后一段时间，郑振铎先生还将中国小说与西方小说加以比较，提出了中国小说的五大特质：根据口头传说写下来的；第二人称的叙述，中间夹杂议论；说唱相间、诗与文相杂；招揽观众的说唱结构；善设关子，制造惊险，逗引观众兴趣^①。

^① 郑振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小说传统》，《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88—289页。